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為例*

黃鴻博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由於中國崛起以及近年與日本、印度、越南及菲律賓等周邊國家的衝突，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本文研究問題是：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眾多，是否可以將諸多原因概念化？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是否變化無常、不可解釋或是僅能靜態分析？如否，何種機制促使中共使用武力？使用武力的最終決策選擇（衝突規模）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約或影響，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

本文借鑑國際關係領域的預防性動機理論、動態差異理論、聯盟理論及窗戶邏輯、心理學的認知理論、經濟學的展望理論及外交政策分析的多元啟發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原因的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希冀建構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並且以 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為案例，採取過程追蹤與類型學等研究方法，用以驗證本模式之適用性。本文透過個案分析，證實了兩個研究假設：（一）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使用武力；（二）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強弱，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選擇，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由此，也初步驗證了本模式的適用性。

關鍵詞：中共對外使用武力、動態衝突抉擇模式、預防性動機、中印邊境戰爭

* * *

註*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的悉心指教，特致謝忱。

壹、前言

自中共建政以來，曾與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及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肇生多次臺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此外，由於中國崛起以及近年中共與日本、印度、越南及菲律賓等國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關注。

本文的研究步驟，首先透過現有理論的借鑑，其次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理論模式並提出與研究問題相關的理論性假設，接續再進行驗證，最後分析檢驗結果，得出研究結論（秦亞青 2008, 8-11）。本文研究問題是：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眾多，是否可以將諸多原因概念化？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是否變化無常、不可解釋、或是僅能靜態分析？如否，何種機制促使中共使用武力？使用武力的最終決策選擇（衝突規模）會受到何種因素的制約或影響，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

本文結合上揭研究問題，借鑑國際關係領域的預防性動機理論、動態差異理論、聯盟理論及窗戶邏輯、心理學的認知理論、經濟學的展望理論及外交政策分析的多元啟發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原因的概念化，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希冀建構一個適合單一或多重個案研究的「動態衝突抉擇模式」，用以檢驗兩個理論性假設：（一）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使用武力；（二）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強弱，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選擇，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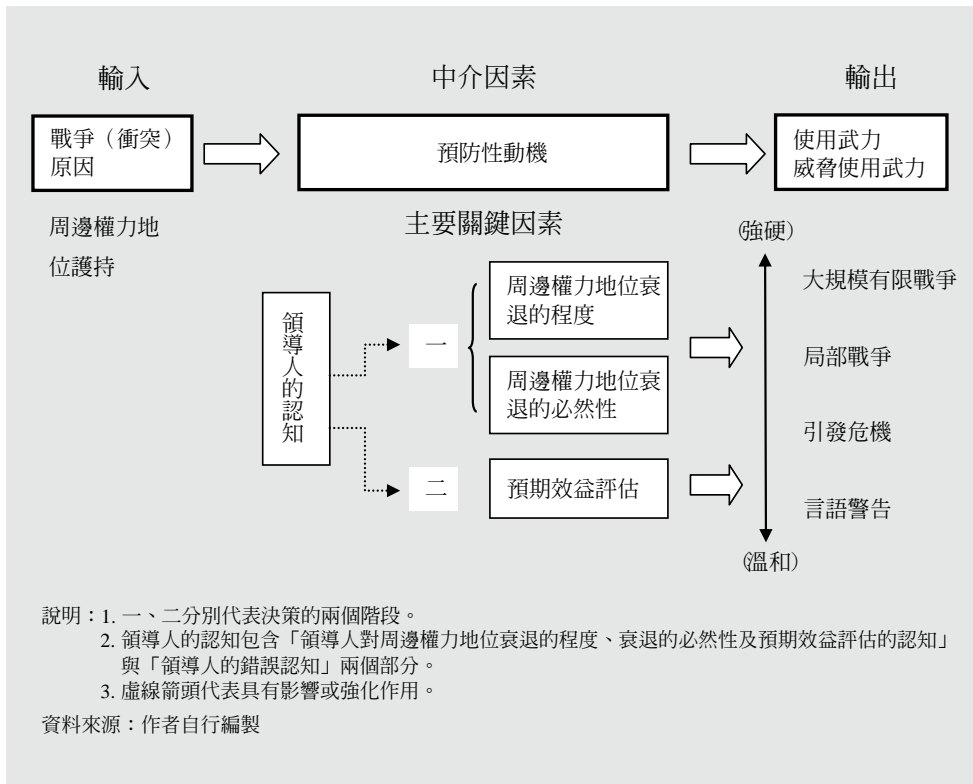
基本上，韓戰、中印邊境戰爭、珍寶島危機、懲越戰爭及三次臺海危機等重要案例，雖然使用武力的原因不同，但預防性動機都是最終促使中共使用武力的中介因素（黃鴻博 2012），由此亦凸顯出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的預防性動機理論，在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研究領域的學術價值。囿於篇幅，本文僅能進行單一個案分析與檢驗。在案例選擇上，依照 John Garring 的「極端、經典、關鍵與反事實」四種案例選擇分類（Gerring 2001, 215-222）。中印邊境戰爭係屬於一般預期不可能發生但卻發生戰爭的「關鍵案例」（crucial case）。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主要倡議者，美蘇極力拉攏的對象，更是繼緬甸之後第二個承認中共政權和實際上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雙方在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立場一致，並沒有根本性的國家利益衝突，且雙方都沒有戰爭的意圖，但最終卻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爰此，本文以 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為案例，採取過程追蹤及類型學

等研究方法，檢驗研究假設與驗證本模式之適用性。

貳、理論借鑑與模式的建構

目前學界並沒有一套公認的模式或理論創設的標準方法，Stephen Van Evera 提出一個有利的技巧，即通過借鑑某個領域的現有理論並加以改造，以適應對其他領域現象的解釋來創造理論（理論性模式）（Evera 1997, 21-28）。本文提出的模式，即是採用 Van Evera 的研究技巧。決策機制如圖 1，說明如后：

圖 1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決策機制示意圖



一、輸入—戰爭（衝突）原因：周邊權力地位護持

探討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時，必然涉及大型戰爭與小型戰爭的起源是否有差異的基本問題。本文傾向於 Manus I. Midlarsky 的觀點，認為導致大型戰爭與小型戰爭的原因不同（Midlarsky 1990, 171-181）；然而，本文認為兩者的預防性邏輯則是一致的。就中共的案例而言，其使用武力的性質，明顯地亦同屬於預防性戰爭（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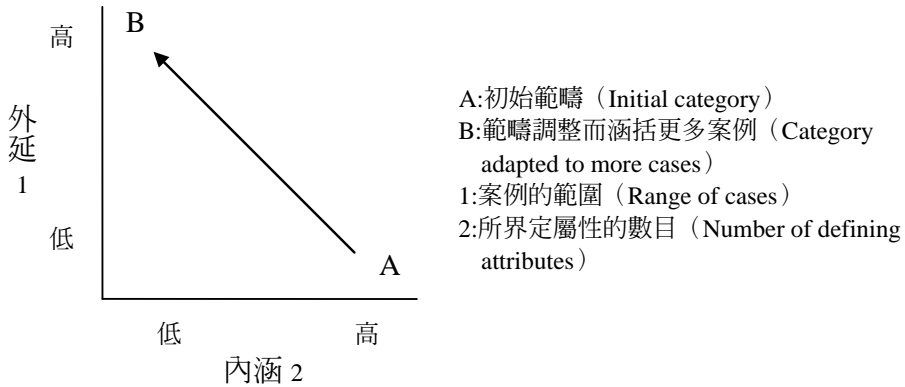
目前學界針對中共歷次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各有不同的解釋，因而出現多重原因的現象。此現象可以從概念範疇（category）的外延（extension）與內涵（intension）兩方面解釋，並依據案例的範圍與屬性予以適當調整位置。如圖 2「概念的普遍化階梯」所示，所謂「範疇的外延」，是範疇所指涉的那個世界中的一組實體（係指經驗層面上的涵蓋性，亦即案例的範圍）。①「範疇的內涵」，則是用於界定範疇，並決定其分子資格的一組涵義或屬性（係指所界定屬性的數目，亦即原因的多寡）（Collier and Mahon 1993, 846）。

外延與內涵之間關係，可表現為兩種形式：(1) 外延較小、內涵較大的更具體的範疇；(2) 外延較大、內涵較小的更普遍的範疇。在分類學層級中，更具體和更普遍的範疇分別占據了初級（subordinate）和次級（superordinate）的位置，初級範疇的外延包含在次級範疇內。David Collier 與 James E. Mahon, Jr. 將兩組術語所描述的層級稱之為「普遍化階梯」（ladder of generality）。渠等以韋伯（Max Weber）的類型學為例，世襲權威是傳統權威的一種類型，傳統權威是三種權威或合法統治的一種類型，而合法統治又是更廣泛統治範疇的一種類型。對於每兩個相鄰的範疇，第一個是初級的，第二個是次級的。與初級範疇相比，相應的次級範疇的涵義更不明確、涵蓋案例更多，因此，它的外延更大、內涵更小（Collier and Mahon 1993, 846）。②

註① 此處及以下有關概念範疇的括弧補充說明內容，係作者結合圖 2 說明及 Gary Goertz 的論述而自行增訂（Collier and Mahon 1993, 846; 徐子婷等譯 2010）。

註② 有關概念的分析，薩托利（Giovanni Satori）採用高、中、低三層次的範疇（categories）。David Collier 與 James E. Mahon, Jr. 運用了初級（subordinate）與次級（superordinate）範疇。Gary Goertz 則採用基本層次（basic level）、次級層次（secondary level）、指標／資料層次（indicator/data level）三個層次範疇。本文採用 Collier 與 Mahon 的初級、次級範疇，基本上與 Goertz 的基本、次級層次相同。此外，Goertz 在分析 Satori 與 Collier 探討概念的研究文獻後，認為渠等研究的核心是「概念的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即外延與內涵之間的對比。基本原則是，當減低內涵屬性時，便同時增加了外延（經驗層面上的涵蓋性，亦即案例的範圍）（徐子婷等譯 2010, 7-8, 69）。

圖 2 概念的普遍化階梯



作者補充說明：1. 箭頭方向代表概念的延展方向。

2. 外延高低代表涵蓋案例範圍的大小。

3. 內涵高低代表屬性的數目（肇生原因）的多寡。

4. 箭頭往 B 點移動，代表外延較大，內涵較小，即可包含的案例較多，但肇生原因較少。

5. 箭頭往 A 點移動，代表外延較小，內涵較多，即可包含的案例較少，但肇生的原因較多。

資料來源：Collier and Mahon (1993, 846)。

從圖 2 可以明顯看出位置靠近 A 點附近，是屬於外延（案例的範圍）較低，內涵（屬性的數目）較高的範疇，因而對戰爭或軍事衝突的解讀，必然容易出現許多不同的原因。相對地，較靠近 B 點，是屬於外延（案例的範圍）較高，而內涵（屬性的數目）較低的範疇。

本文提出「周邊權力地位護持」概念作為次級範疇，是基於以下理由：第一，外延係借鑑強調動機的預防性動機理論與對現狀維護的展望理論等核心論點，並結合中共的歷史經驗，因此，此概念的位階不致於過高、抽象而難以觀察、解釋；第二，就實力、意圖與歷史案例而言，中共使用武力的範圍明顯僅限於周邊地區，衝突的對象是可能對其現有權力地位形成威脅和挑戰的周邊國家；第三，具備了整體性與穩定性兩個條件，可用以解釋特定時期的中共核心國家利益（Krasner 1978, 42-45）；第四，符合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目標。^③

註③ Elizabeth Economy 與 Michel Oksenberg 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服務於五個目標：維護中國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削弱臺灣的地位、樹立良好形象和促進經濟利益。前三項目標顯然符合本文提

「周邊權力地位護持」概念，在外延部分，中國是歷史上居東亞主導地位的區域性霸權，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外延必然比全球性霸權低（靠近 B 點）；相對地，但又比一般中、小型國家高（靠近 A 點）。因此，其外延不能太高，也不應太低，合理的位置應是靠近 A 和 B 點中間附近。由於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案例不多，因而也可以包含所有的案例。

在內涵方面，誠如 Quincy Wright 所言，戰爭（衝突）的原因具有複合性（Wright, 1942, 17），因此，中共對外使用武力原因是學界探討最多，也是觀點最分歧的部分。整體而言，以韋伯的類型學為例，可將「周邊權力地位護持」（次級範疇）的內涵，區分為「領土主權維護」與「周邊安全維護」兩大類型（初級範疇）（黃鴻博 2012, 25-44、73-75）。

領土主權紛爭是國際衝突最普遍的一種肇因（Vasquez and Henehan 2001, 123-138）。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提出的「領土鞏固假說」（territorial consolidation hypotheses）認為中共對外衝突，大部分是領土性質的。他發現中共的對外軍事衝突中，幾乎有一半與領土爭議有關；隨著爭議邊界百分比降低，衝突行為也相對減少（Johnston 1998, 18-20）。

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則從中共因領土爭議而使用武力的案例中，推論出「談判議價權力的負面轉變」（negative shifts in bargaining power）概念，認為此乃最能解釋中共在領土爭議中使用武力的原因。他強調在「談判議價權力衰退」的時候，通常會導致領土爭議的升高。針對中共在領土爭議上使用武力的模式，傅泰林認為對國際關係理論有以下兩個意涵：(1) 中共使用武力模式可以進一步支持「預防性戰爭理論」，展現這個理論在檢視諸如領土爭議等特別利益衝突的實用性；(2) 中共的行為挑戰了現有強調崛起的強權比正在衰弱的強權，更可能使用武力的「權力轉移理論」看法。中共使用武力的時機，通常是在爭議地區的權力衰退而不是增強的時候（Fravel 2007, 46-47）。

此外，傅泰林提出兩個制約「談判議價權力負面轉變」的因素：（一）爭議領土的重要性（salience）。如果爭議領土的軍事、經濟或象徵性的價值愈高，則國家對於喪失談判權力的敏感度就愈高；（二）更廣泛的安全環境。當國家面臨國內或國外的威脅時，常會擴大其在領土爭議中權力下降的認知，對於對手的意圖會採取最壞的假設，會認為對方想在我方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取得利益，進而判定必須採

出的周邊權力地位護持概念相符，後兩項目標則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後，透過非軍事行為所欲達成的目標（Economy and Oksenberg 1999, 20-22）。

取反擊，否則情況將會持續惡化。Fravel 總結認為中共最有可能動武的情況是：當一個重要的爭議領土面臨敵對國家在政治或軍事壓力，並且遭遇其他的安全挑戰時，最容易使用武力。相反地，面對較不重要的領土，談判議價權力較敵方穩定，且在國內外未遭受到其他挑戰時，比較不會使用武力（Fravel 2007, 52）。

本文結合前述「領土鞏固假說」及「談判議價權力的負面轉變」概念的核心觀點，「領土主權維護」（次級範疇）可以進一步區分為「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與「核心地區領土主權維護」兩種內涵（初級範疇）。

臺灣問題所引發的三次臺海危機，學界的看法雖有差異，例如採用「轉移戰爭理論」（diversionary war theory）的觀點分析中共發動第二次臺海危機與大躍進運動的關聯性。但整體上可以將「核心地區領土主權維護」視為是主要原因，中共在核心領土主權上是無法退讓的。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的論述觀點略顯分歧，但此戰役可視為是「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的關鍵案例，中共重視的是「談判議價權力」（黃鴻博 2012, 25-36, 110-133, 159-181, 225-244）。

「周邊安全維護」（次級範疇）可以視為是另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主要原因。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從「趨勢分析」（trend analysis）的角度，發現中共有時會使用武力對抗優勢敵人及其盟友，因為擔心若不採取行動，則未來的戰略情勢只會更加惡化。他認為在研究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時，必須了解中共對於未來長期趨勢的認知是危險的或者有利於其安全，以及儘管危險，但使用武力是否被中共領導人視為是降低、停止或改變不利其安全利益趨勢的最有效方式（Christensen 2006, 50-85）。

在歷史案例中，1950 年韓戰可用「維護東北地緣政治安全」的觀點說明；1969 年珍寶島衝突中，意識型態分歧僅是導因，若從「反霸權主義」的角度反而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釋；同樣地，從「地緣政治安全」與「反霸權主義」的角度分析 1979 年懲越戰爭，則較具有說服力（黃鴻博 2012, 89-109, 182-202, 134-157）。爰此，本文將「周邊安全維護」（次級範疇）區分為「地緣政治安全」與「反霸權主義」兩種內涵（初級範疇）。

表 1 周邊權力地位護持內涵類型表

領土主權維護	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	核心地區領土主權維護
	中印邊境戰爭	三次臺海危機
周邊安全維護	地緣政治安全	反霸權主義
	韓戰、懲越戰爭	珍寶島危機、懲越戰爭

說明：1. 上表旨在說明「周邊權力地位護持」的概念範疇內涵。

2.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案例可能涉及上揭單項或多項內涵。

3. 案例可視研究成果而增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二、中介因素：預防性動機

Jonathan B. Renshon 認為並非所有的預防性戰爭，都是為了維持權力平衡的目的，考察其預防性動機很重要（Renshon 2007, 203）。目前有關預防性動機論述，以 Jack S. Levy 的「預防性動機理論」（preventive motivation theory）最具代表性。他批判現有體系層次的權力轉移理論，均忽略了預防性動機在戰爭爆發中扮演的特殊關鍵性角色（Levy 2007, 183）。

Levy 認為戰爭的預防性動機「是源於國家領導人認知到自身軍力及潛在力量與另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相較之下正處於衰退，並且擔心此衰退的結果。領導人通常會害怕這種衰退將弱化自身的談判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並且會相應導致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在現狀下所享有相關利益的衰退。這使得主導國家可能會面臨未來必須在危險戰爭與犧牲重要國家利益之間做出選擇。在此兩難情況下，主導國傾向於透過戰爭手段來維持現狀，而不是依其偏好而改變現狀」（Levy 1987, 87-88）。簡言之，預防性戰爭較關注的是將自己未來衰退的損失最小化，而不是藉由現在發動戰爭以取得最大化的利得。

此外，Levy 認為預防性動機適用於包含非戰爭的使用武力、有限的預防性打擊，甚至可能引起兩國全面性戰爭的預防性戰爭，並且將「預防性動機」視為是戰爭（衝突）爆發的中介因素。透過此中介因素，方能說明為何最後會導致戰爭（衝突）的爆發（Levy 1987, 87; Levy and Gochal 2001, 9; Levy 2007, 178, 182, 184-185）。

本文採用 Levy 的預防性動機理論，將「預防性動機」視為是中共對外使用武

力的中介因素。換言之，有衝突（原因）並不代表會導致戰爭，唯有肇生預防性動機時，才會最終促使中共選擇對外使用武力。

透過前文分析，本文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定義為：「國家領導人認知到自身的周邊權力地位與另一個崛起中的國家（或挑戰國）相較之下正處於衰退，並且擔心此衰退的結果。領導人通常擔憂這種衰退，將會相應導致其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核心地區領土主權維護，以及地緣政治安全、反霸權主義等現狀下所享有之相關利益或能力的衰退。這使得中共可能會面臨未來必須在危險戰爭與犧牲重要國家利益之間做出選擇。意即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是防止周邊權力地位的衰退」。

基於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主要驅動因素（秦亞青 2008, 9）。表 1 所示「周邊權力地位護持」的諸項內涵，可以視為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核心國家利益，也是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主因。由於國家間權力關係總是呈動態變化，區域內其他國家亦不斷發展，也就可能在不同的議題或核心國家利益上引起與中共的衝突。如果衝突的整體威脅趨勢無法遏止，甚至持續惡化，則可能被中共視為是對其周邊權力地位的挑戰。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將可能最終促使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據此，可以提出第一個理論假設：

假設 1：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使用武力。

三、主要關鍵因素

有關影響預防性動機的主要關鍵因素主要可區分「領導人的認知、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與預期效益評估」等四項。

（一）領導人的認知

認知學派特別強調認知過程如何影響外交決策選擇（Jervis 1976）。John G. Stoessinger 認為領導人的認知是舉足輕重外，特別強調錯誤的認知是最具決定性（Stoessinger 1978, 221-231）。

Levy 認為兩種型式的錯誤認知最重要：1. 低估對手實力與第三國可能干預，及其對戰爭結果之影響的過度自信；2. 過度高估對手的敵對意圖（Levy 1983, 91-93）。此外，領導人也通常會低估了第三國為干預而加入敵國陣營，但自身潛在友邦卻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或者因為低估第三國的實力，而錯估了其介入的可能性（Levy 1987, 101）。

此外，邏輯上，領導人的認知應可區分非錯誤認知與錯誤認知兩個部分。Robert Jervis 的研究發現兩種情況下，國家間會發生衝突：1. 作為對手的雙方或其中一方旨在改變現狀，確實有侵略和發起衝突的意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否存在錯誤的認知，衝突都難以避免；2. 雙方都是維持現狀國家，都不希望發生衝突，但衝突還是發生了。Jervis 認為第二種情況下，衝突發生的重要原因是領導人的錯誤認知。^④

（二）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

Dale C. Copeland 的「動態差異理論」（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認為在多極和兩極體系中，是那些正在衰退的國家會發動戰爭。至於何時發動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自身「衰退的程度」（the extent of its fall）和「衰退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之估計。衰退的程度，即離衰退的最低點還有多遠；衰退的必然性，即如果某個國家堅持現行的政策，其衰退的必然性。國家對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的預期越高，就越容易發動預防性戰爭。如果衰退是「非逆轉性停滯」（caused by entrenched stagnation relative to the rising state）所造成的，則必然會引起焦慮。國內所能採取克服停滯的措施越少，國家就會認為衰退越嚴重、越不可避免（Copeland 2000, 4-5, 20）。

動態差異理論雖然是體系理論，但其對傳統預防性戰爭理論的批判與繼承，尤其是「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論述，可視為是對威脅趨勢的整體評估，此理論的核心觀點恰與預防性動機理論具有互補效用，可用以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案例，尤其有利於說明預防性動機與最終決策選擇的動態關聯性。

然而，Copeland 的動態差異理論是以體系戰爭為分析對象，故而借鑑其核心觀點時，應切合中共的國力與使用武力範圍。爰此，本文結合前述的「周邊權力地位護持」概念，將兩項核心觀點界定為「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並且作為本模式的兩項主要關鍵因素。兩者與決策選擇結合後，即可使衝突抉擇呈現出動態樣式。

（三）預期效益評估

Levy 認為戰爭的預防性動機大致上可以基於「預期效益評估」（expected-utility calculations）的理性成本效益架構（cost-benefit framework）決定，即「對

註④ 上揭論述係引自秦亞青教授翻譯 Robert Jervis 所著《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的導文〈譯者前言：杰維斯及其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秦亞青譯 2003, 13）。

延後發動戰爭或現在發動戰爭的成本效益評估」（Levy 1987, 87, fn. 13）。

1. 延後發動戰爭的成本效益

影響預防性動機強度的最重要判準，是預防者對軍力與潛在實力，轉為對敵國有利的認知程度。敵國的預期優勢越大，其相對談判議價地位與預防者可能讓步的程度越低，且未來戰爭的代價越高，因此，現在就發動戰爭以阻止敵國崛起的預防性動機就越強（Levy 1987, 97-98）。此外，面對一個快速崛起的敵國，當決策者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時，他們鮮少有處理危機的動機，反而會集中心力用於防衛準備，或嘗試確保戰爭發生在一個合適的時機。因此，對戰爭不可避免的認知，也會影響決策過程，甚至可能因為「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而導致戰爭的爆發（Levy 1987, 98-99）。

2. 現在就發動戰爭的成本效益

現在就發動戰爭的重要判準是預防者的「預期勝利或然率、被擊敗的相關風險與兩者的預期代價」。此外，對其他國家可能干預的預判，特別是強權的干預更是關鍵。預防者面對的是一個強大、逐漸崛起，但外交孤立的敵國時，通常有利於預防性動機的產生，因為對預防者而言，可以降低被擊敗的代價與風險。另一個會影響戰爭結果的重要因素是軍力的攻守平衡，即攻擊者擊敗防禦者所需的優勢程度。越是具有攻擊的有利條件，預防者選擇攻擊的潛在優勢就越強，因而也就越具有預防性動機（Levy 1987, 100）。鑒於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層次與體系戰爭不同，因此，本文相應地將兩項成本效益評估修訂為「延後採取軍事行動」與「現在採取軍事行動」的成本效益評估。

綜上，本文將「領導人的認知」區分為「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衰退的必然性及預期效益評估的認知」與「領導人的錯誤認知」兩個部分。然而，前述主要關鍵因素在決策層次上有所不同。本文採用「多元啟發理論」（polyheuristic theory）的「決策兩階段」，^⑤將「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兩個關鍵因素，界定為決定預防性動機的第一個階段，是「領導人對整體威脅趨勢的評估」，兩者的強弱程度會影響未來的決策選擇，此階段乃是否產生預防性動機的關鍵。

「預期效益評估」則是決定預防性動機的第二個階段，是使用武力前的客觀評

註⑤ 「多元啟發理論」結合「認知理論」與「理性抉擇理論」，將決策過程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認知階段，主要是對所有可能的方案進行認知分析並加以篩選。第二是理性抉擇階段，決策者在此階段篩選出最終的政策方案，並對方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Mintz 2004, 7; James and Zhang 2005, 32-36）。

估，主要針對衝突是否不可避免、預期勝利或然率等客觀環境與敵我軍事、外交等能力的分析，最終決定延後或現在採取軍事行動。

四、評估指標

（一）領導人的錯誤認知

如前文預防性動機理論所述，在領導人的錯誤認知中，尤以「低估對手實力與第三國可能干預、對戰爭結果之影響的過度自信、過度高估對手的敵對意圖」等最重要。上揭均可視為是評估領導人錯誤認知的指標。然依據實際案例，中共使用武力範疇包含了從溫和到強硬的不同決策選擇，因而本文將「對戰爭結果之影響的過度自信」，修訂為「對戰爭（衝突）結果之影響的過度自信」。

再者，本文認為「過度高估外援及聯盟的作用」、「錯估對手的進攻意圖」與「政策失誤」，亦可視為評估是否肇生錯誤認知的指標。在「過度高估外援及聯盟的作用」方面，Walt 的「聯盟理論」深具參考價值，衝突雙方都有可能「過度高估外援及聯盟的作用」。「錯估對手的進攻意圖」，可能是本身過於自信，而誤以為敵方對我之行動，不會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反制，或者誤以為對手即將進攻而先發制人。「政策失誤」則可能是出於緩和衝突下的暫時性政策，也可能是追求某種有利於己方的政策，但卻導致對方產生錯誤的認知，而採取更具威脅或急迫感的對應政策（黃鴻博 2012, 80-81）。如表 2 所示，上揭七項類型可視為是研判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是否出現錯誤認知的評估指標。

表 2 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錯誤認知類型表

類型 案例	錯估對手 進攻意圖	低估對 手實力	低估第三 國可能干 預	對戰爭（衝 突）結果之影 響的過度自信	過度高估 對手的敵 對意圖	過度高估 外援及聯 盟的作用	政策失誤
案例一							
案例二							

說明：1. 本表旨在說明主要關鍵因素—「領導人的錯誤認知」之諸項類型是否在案例中出現。

2. 表中加註「○」符號，代表具備該類型的錯誤認知。

3. 案例可視研究需要而增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二）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參考點

本文借鑑「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的「參考點」（reference point）概念，將其視為是評估「衰退程度」的指標。展望理論的核心觀點可概括為：人們傾向於根據一個參考點來評估其決策；相對於收益，人們更關注損失；珍惜目前所擁有的，甚於對未來的企求；面臨收益時，行為趨向於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當面臨損失時，則趨於風險接受（risk acceptance）（Levy 1997, 87）。

展望理論認為當領導人察覺到必須維護現狀，而且相信如不戰鬥則無以保有其核心價值或利益時，軍事衝突通常比較容易爆發。邏輯上，當爭議的雙方領導人都認為其行動是防衛合法的現狀時，將使雙方處於最危險的情境（Cashman and Robinson 2007, 7-8）。尤其在領土爭議上，一個損失領土的國家，其參考點通常是領土損失前的原狀，將目前的現狀視為損失，並且採取風險尋求策略以恢復失土。相對地，一個獲取新增領土的國家，會產生「立即的稟賦效應」（instant endowment effect），^⑥將參考點調整至新的現況，並且也會採取風險尋求策略以防止損失。

本文認為中共領導人面對外在威脅與衝突時，亦會根據一個參考點來判斷自己是收益或是損失，並以此參考點作為評估備選方案與確定決策選擇的重要指標。此參考點亦可視為是中共領導人決定使用武力的底線或門檻。

（三）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窗戶邏輯

目前有關窗戶概念的相關論述，以 Stephen Van Evera 提出的「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與「脆弱之窗」（window of vulnerability）概念較具代表性，前者是一種正在減弱的進攻性機會，而後者是一種正在成長的防禦性弱點（Evera 1999, 74）。^⑦

在趨勢分析研判上，本文借鑑 Van Evera 的「機會之窗」與「脆弱之窗」概念之邏輯，將「對敵我力量對比變化情形」與「自身對現狀（現行政策）維護之掌控能力的主觀認知」，視為領導人判定機會之窗即將關閉，或脆弱之窗即將開啓的評估指標。

註⑥ 「立即的稟賦效應」係指在一連串的收益後，人們將會重新設定其新現狀中的參考點，任何的後續退讓（setback）都會被視為損失，此外，會過於重視損失，並且採取風險尋求的行為，以維持其新的有利位置，避免損失（Levy 2003, 218, 226-227）。

註⑦ 所謂「正在減弱的進攻性機會」，是指敵對我的威脅而言，而「正在成長的防禦性弱點」，則是指我方的劣勢。

（四）預期效益評估：延後採取軍事行動或現在採取軍事行動的成本效益評估

如表 3 所示，本文將「對敵國的預期優勢、我方的優勢邊際維持及領導人對衝突不可避免的評估」、「預期勝利或然率、被擊敗的風險與第三國可能介入」，分別視為是延後或現在採取軍事行動的預期效益評估指標。上揭指標，尤以「領導人對衝突不可避免的評估」與「預期勝利或然率」最重要。領導人對衝突不可避免的評估，會強化「現在行動比爾後行動佳」的認知，急迫感會促使領導人無法再延後採取軍事行動。「預期勝利或然率」則是現在採取軍事行動的主要考慮因素，如果軍事行動能達到所望之政治或軍事目標的或然率越高，則在衝突不可避免的評估下，通常會強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

表 3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預期效益評估表

評估 指標 案例	延後採取軍事行動			現在採取軍事行動			評估結果
	對敵國的 預期優勢	我方的優 勢邊際維 持	領導人對衝 突不可避 免的評估	預期勝利 或然率	被擊敗的 風險	第三國可 能介入	
案例一							
案例二							

說明：1. 本表旨在說明主要關鍵因素—「預期效益評估」的諸項評估指標，最終決定延後或現在採取軍事行動。

2. 符號「<」代表較低；「>」代表較高；「=」代表概等。未顯示上述符號時，表示該案例未具備該項指標。

3. 案例可視研究需要而增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五、輸出：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最終決策選擇，主要可以區分為「大規模有限戰爭、局部戰爭、引發危機與言語警告」等四項從強硬到溫和的不同決策選擇類型。雖然規模不同，但仍屬於使用武力範疇，第四項決策選擇—言語警告，則屬於威脅使用武力範疇（黃鴻博 2012, 85）。

在預防性動機與決策選擇的關聯上，衝突過程中，錯誤的決策選擇也可能導致「作用—反作用」的螺旋性衝突升級，而無意間引發更激烈的衝突。因此，領導人必須採取「數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選擇策略。按照 Copeland 的解釋，通過瞭解那些有助於這種權衡的因素（the factors that shape these trade-offs），就可以確定

衰退中的行為者，分別在什麼條件下接受和解、採取更具挑釁性的政策，或做出最後的選擇－發動預防性戰爭（Copeland 2000, 35-36）。

本文認為前述決定預防性動機的第一階段：「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之強弱」，即是上述的權衡因素，會影響最終決策選擇。邏輯上，衰退的程度與必然性都很弱，則理應採取言語警告的決策選擇，反之，都很強烈，則會採取大規模有限戰爭的決策選擇。至於衰退的程度弱，衰退的必然性強，因為尚未跨越參考點（底線），應該會採取引發危機的決策選擇；相對地，如果衰退的程度強，衰退的必然性弱，因為已經跨越參考點，理應採取比引發危機更強烈的局部戰爭之決策選擇。在檢驗上，將以表 4 顯示兩者的關聯。基此，可以進而提出第二個理論假設：

假設 2：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強弱，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選擇，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

表 4 整體威脅趨勢評估與決策選擇類型表

		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	
		弱	強
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	弱	言語警告	引發危機
	強	局部戰爭	大規模有限戰爭

- 說明：1. 本表旨在顯示兩項主要關鍵因素－「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其整體威脅趨勢評估的強弱與決策選擇的關聯。
2. 同一案例中，可能會隨著衝突逐漸升高，而在各階段出現不同的決策選擇。本表僅顯示衝突的最終決策選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最後，透過個案分析與模式檢驗，可用表 5 顯示整體研究結果，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領域，提供一個比較合理，且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解釋。

表 5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檢驗示意表

模式 檢驗 案例	周邊權力 地位護持 內涵	領導人的 錯誤認知		周邊權力 地位衰退 的程度		周邊權力 地位衰退 的必然性		預期效益 評估		預防性 動機		決策選擇
		有	無	強	弱	強	弱	延後	行動	有	無	
案例一												
案例二												

說明：1. 本表綜合表 1 至 4 之研究成果。顯示案例中之「輸入－周邊權力地位護持的內涵：四項主要關鍵因素的評估結果、及其與中介因素－預防性動機、輸出一決策選擇」的關聯。

2. 周邊權力地位護持包含「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核心地區領土主權維護、地緣政治安全及反霸權主義」等四項內涵；每一個案例可能包括一項或多項內涵。

3. 最終決策選擇包含「大規模有限戰爭、局部戰爭、引發危機及言語警告」等四項。

4. 案例可視研究需要而增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參、個案分析：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

中共建政初期，除了西藏問題的分歧外，中印兩國關係密切，1954-58 年可視為是兩國關係的蜜月期，但 1959-62 年中印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在邊界問題上的矛盾和衝突不斷加深，最後爆發兩次大規模軍事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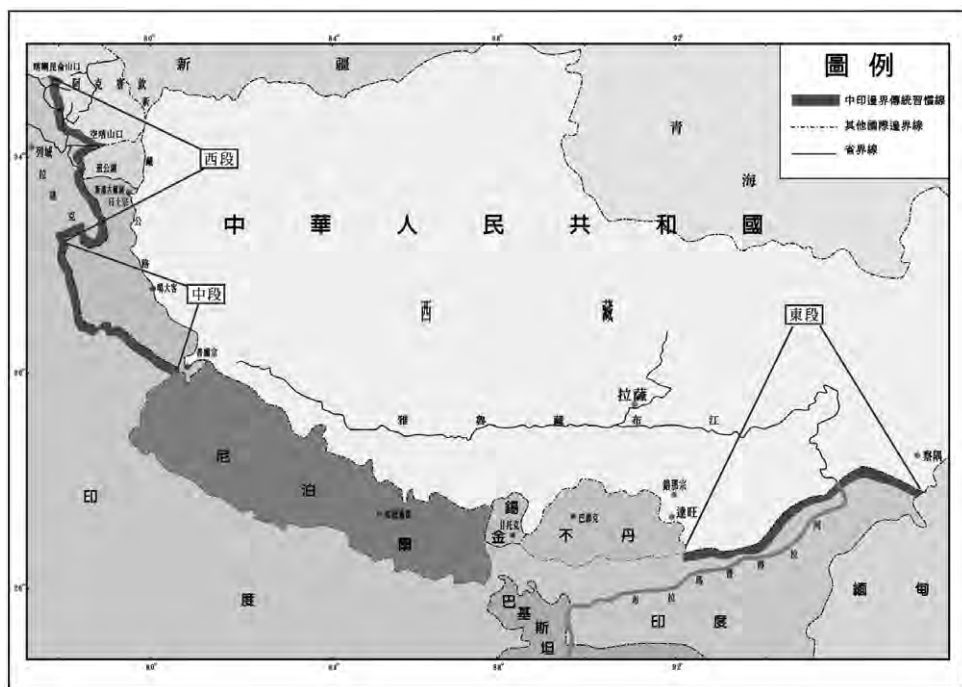
一、中印邊界劃分與立場

中印邊界全長約 2000 公里。一般習慣將中印邊界劃分為西、中、東三段。西段是指新疆、西藏與克什米爾（Kashmir）印度管轄區拉達克（Ladakh）接壤的一段邊界。印度在西段對中共提出的領土要求約 3.35 萬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一塊是阿克賽欽（Aksai Cin）地區，面積為 2.72 萬平方公里，是中共「新藏公路」所經之處。中段係指北起西段傳統邊界線的南端，往東南行，至西藏阿里（Ari）與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三地交界處的里普列克山口（Lipu Lekh）附近止，全長約 450 公里。中段的實際控制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的地區面積約 2000 平方公里，現為印度所占領。東段則是從不丹以東起，至中、印、緬三國交界處止，全長約 650 公里，涉及在實際控制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約 9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歸屬問題。在東段

經常提到的有三條線，即傳統習慣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和實際控制線（王宏偉 2009, 149-155）。

在邊界立場上，中共認為中印邊界未經正式劃定，且雙方對傳統習慣線的位置有很大的認知差異，需透過友好協商後而適當調整；印度則認為雙方邊界是清楚的，兩國之間不存在邊界爭端（隨新民 2007, 99, 138; Hoffmann 1990, 25）。在此認知下，中印雙方在邊界的舉動，就容易被對方視為是挑釁行為，必須對應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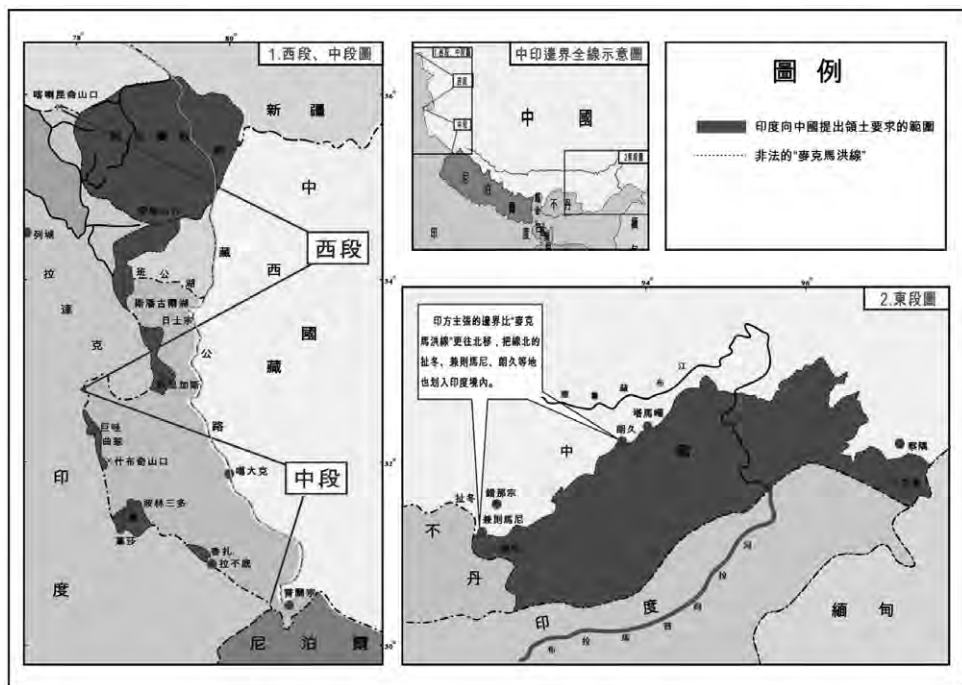
圖 3 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示意圖



說明：原為黑白圖色，彩色部分係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人民出版社編（1962 第 2 版，附圖 1）。

圖 4 印度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示意圖



說明：原為黑白圖色，彩色部分係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人民出版社編（1962 第 2 版，附圖 2）。

二、領導人的錯誤認知

本文認為中共採取的「獲取西藏主權—解決西藏與印度關係—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三步走策略，使得印度產生錯誤認知，而 1954 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區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以下簡稱：西藏協定），^⑧實居關鍵性角色。

中共在 1951 年雖然已解決西藏主權問題，但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關係尚待處理。1953 年 9 月 2 日，尼赫魯致電周恩來，建議兩國政府盡早就中印西藏地方關係進行談判。雙方於 1954 年 4 月 29 日簽訂了《西藏協定》（尙勸余 2009, 50-

註⑧ 印度名為「Panch Sheel」協定。

54)。雖然雙方都對此協定的簽訂而感到滿意，但事實上，此協定正是肇生雙方領導人錯誤認知的導因。主要體現在雙方不僅未在此有利時機談判邊界問題，甚至將「和平共處五原則」納入序言。

根據時任中共談判代表的楊公素回憶：

「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就是在周恩來接見印度談判代表團時首次親自提出來的。印度代表團完全同意這些原則。後來在起草協定時，我們沒有寫上這五項原則，當時考慮這些原則是我方提出的，不便寫在協定上強加於人。印度方面反而提出要在協定序言，正式寫上這五項原則，我們自然欣然接受（張植榮 2000, 18）。

中共領導人的立意不難理解，主要希望以此作為解決西藏與邊界問題的標準，以穩定兩國的關係。在談判的過程中，當時中共的策略是：只就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問題進行談判，不成熟的問題包括「麥克馬洪線」在內的邊界問題，留待以後條件成熟再談（王宏緯 2009, 89）。但印度的意圖則正與中共相反，尤其是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第一條「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印度希望利用這一原則，來排除北京未來對其邊界主張的任何挑戰。

事實上，印度在 1951 年 2 月就已非法占領了達旺（Tawang）地區，當時中共並沒有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議。中共對「達旺」問題不動聲色的默認，使印度政府相信其對整個東北邊境特區的控制不會遭致北京的任何反對。^⑨

當時中共或許可用朝鮮戰爭無暇處理，來解釋為何沒有具體反制作為，但 1953 年後，印度又繼續向北推進，到了 1954 年幾乎占領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全部領土，並且公然設置了「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簡稱 NEFA）。然而，《西藏協定》談判期間，中共領導人並未針對印度在 1954 年以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擴張行為，提出抗議或協商談判，^⑩這顯然是中共在處理中印

註⑨ Neville Maxwell 與 Karunakar Gupta 均認為中共的有意默認，使得其對印度政府加速在麥克馬洪線的軍事與行政推進不置可否，且強調中共的反應與國民黨相差甚大，國民黨在 1946～1949 年期間，對印度侵入東北邊境特區的問題上，曾多次提出抗議照會（王宏緯、王至亭譯 1990, 24-25; 鄭經言譯 2000, 32）。

註⑩ 根據當時參與談判的楊公素訪談紀錄：在談判前，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中央政府在這次談判中收復被英印占去的土地。所謂失地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被英印占領的麥克馬洪線以南土地；二是歷年來

邊界問題上的一個嚴重失誤。此舉不但使中印雙方喪失了一個有利於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機會，事實上等於向印度默示，中共有意以麥克馬洪線為邊界。

印度的錯誤認知，可從 1959 年 12 月 2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給印度駐華大使館的照會」窺知，中共針對「中國政府是否曾經同意邊界已定和接受印度政府對邊界的主張，而後來改變了立場」提出以下申述：

印度政府提到 1954 年的中印協定，認為這個協定已經處理了印度同西藏地方之間的全部未決問題，因此，邊界問題應被認為已經解決。事實上，1954 年的中印協定是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根本沒有涉及邊界問題，在條文中找不出任何有關邊界的規定（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46）。

由此正足以解釋為何尼赫魯在 1954 年 7 月向有關各部會散發的一項通報裡，將《西藏協定》說成是「我們同中國和西藏關係中的新起點」。他說：

根據我們的政治以及作為與中國達成協議的結果，北部邊界應被看作是確定的和明確的邊界，不容與任何人進行討論，應當在整個這段邊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認為是有爭議的地區建立一個哨所網（鄭經言譯 2000, 32-33, 註 1）。

在此認知下，1954 年 7 月，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圖始改變了以往對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將麥克馬洪線以南，原本「未標定」的區域劃歸印度領土。關於中印邊界西段，在 1954 年以前，英國和印度的地圖都未標出過任何確定的界線，後來新地圖將克什米爾塗成一片彩色，並標明「邊界未經標定」的字樣（王宏偉 2009, 111-112）。

顯然地，中共領導人當時採取的談判三步走策略，有明顯的政策失誤。中共希望漸進式地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因而提出「只就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問題進行談

被英印占去的自拉達克（Ladakh）到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以北的廣大地區。楊公素到北京後即將上述意見向外交部章漢夫副部長及亞洲司司長陳家康等匯報，他們認為此次談判是否涉及邊界問題，尚須請示周恩來總理（張植榮 2000, 17）。但事後證明，周恩來在此次談判中，並未將邊界問題納入。

判，不成熟的問題，包括麥克馬洪線在內的邊界問題，留待以後條件成熟再談」的策略，但這種等待適當時機再解決邊界爭端的政策，印方顯然無法接受。^⑪如前文展望理論的論述，一個獲取新增領土的國家會產生「立即的稟賦效應」，將參考點調整至新的現況，並且也會採取風險尋求的策略以防止損失。對印度而言，《西藏協定》即已對其產生立即的稟賦效應，任何的退讓都會被視為是損失。由此觀之，中共的政策失誤，反而致使印度領導人對中共談判策略之意圖產生了錯誤認知，進而採取被中共視為威脅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對應政策。

1959 年 3 月西藏暴動後，兩國關係迅速惡化。中共增加了在邊境地區的軍隊，印度亦相應地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部署（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 118）。尤有進者，印度更錯估了中共的進攻意圖，採取了被中共視為具有挑釁性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⑫由此產生的惡性循環，致使雙方陷入安全困境中，衝突亦不斷升溫。

表 6 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錯誤認知類型表

類型 案例	錯估對手 進攻意圖	低估對 手實力	低估第三國 可能干預	對戰爭（衝 突）結果之影 響的過度自信	過度高估 對手的敵 對意圖	過度高估 外援及聯 盟的作用	政策 失誤
1962 年 中印邊 境戰爭							○

說明：表中加註「○」符號，代表具備該類型的錯誤認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三、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

在中印邊界爭議上，中共關注的焦點是西段阿克賽欽地區。此戰略要域不僅是

註⑪ 根據《1962 年與中國衝突的歷史》這本內部資料發行，未對外公布的印度軍方史書顯示，周恩來致尼赫魯總理信函中，承認 1954 年的確沒有提出邊界問題，主要是因為「當時解決的條件尚不成熟，中國方面也沒有時間去研究這個問題」。但印方認為假如當時中國對印度的領土界線持有懷疑，則中國同意依照 1954 年協定尊重印度領土完整的目的為何？印方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領土要求，秘而不宣，假裝與對方友好與和睦，在自己認為時機成熟時，再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提出來，都是不可思議的（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29）。

註⑫ 印度「前進政策」的初期目標，是防止中方向無人占領地帶進一步推進，後來轉變為迫使中國從已經占領的哨所退回去（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2）。

中共領導人極力維持現狀的核心利益所在，亦可視為是評估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程度的「參考點」，因此中共在西段始終保持堅定的立場，寸土不讓。但中共領導人為何如此重視阿克賽欽地區？從 1959 年 12 月 26 日「中共外交部給印度大使館的照會」中，可以看出端倪。照會強調：

這個地區是聯結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命脈，因為在這個地區的東北就是新疆的大戈壁，那裡同西藏簡直不能有什麼直接交通。……從 1956 年下半年，中國政府通過這個地區派出首批進入西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九年來，駐在阿里地區的中國部隊一直正常地、頻繁地通過這個地區，由新疆方面取得不可缺少的補給（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38）。

由此可知，阿克賽欽地區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新藏公路」是當時聯繫新疆與西藏的重要通道，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或缺的補給線，一旦遭到威脅，則新疆與西藏地區的整體戰略態勢將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此外，在當時印度已實際控制東段與中段爭議地區的情況下，中共根本不可能放棄已實際控管絕大部分，且具有戰略地位的西段阿克賽欽地區。

然而，1958 年 8 月 21 日，印度向中國發出照會，就中國官方出版的地圖提出抗議。10 月 18 日，印度再照會中國，就中國在阿克賽欽修築公路提出抗議，並第一次正式對阿克賽欽提出明確的領土要求（尙勸余 2009, 138）。

為了解決雙方邊界問題，周恩來赴印度會談前，搶先在 1960 年 1 月 28 日與緬甸簽訂《互不侵犯和邊界問題的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 1993, 270），事實上，中共與緬甸簽訂的邊界條約，的確是承認「麥克馬洪線」，並以此為基準。中共明顯向印度暗示，可以採取「一攬子」解決方案，用東段換取西段的爭議領土（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 119-220; 隨新民 2007, 141-142），只要經過正式談判而重新簽訂邊界條約，即可解決雙方邊界問題（陸仁譯 1976, 104; Lamb 1964, 168-170）。然而，此舉並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印度反而認為在與緬甸的邊界問題上，中國已經承認了麥克馬洪線，但一談到中印邊界時，同一條邊界線便成為非法的，中共論點的矛盾之處十分明顯（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65）。

自從 1960 年 4 月周、尼會談後，尼赫魯始終堅持任何的邊界談判，都必須以中共從印度認定的領土撤退為先決條件，尤其是西段。尼赫魯的強硬態度使中共當

局試圖以談判方式解決邊界爭端的希望落空。此後，1962 年春夏，印度開始積極實施具挑釁性的「前進政策」，在爭議地區建立新的哨所和修築新的公路，至 7 月底，印度控制了阿克賽欽地區約 3500 平方公里的領土（尙勸余 2009, 152）。此舉明顯已跨過了中共領導人的參考點，不僅破壞了現狀的維持，威脅到事關邊疆安全的戰略要域，並且降低了未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議價權力。

四、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

中共建政後，兩國雖然在西藏問題上潛存著爭議，時至 1958 年為止，中印關係尚穩定，使得中共力求穩定西南邊疆的機會之窗得以保持。然而，1959 年 3 月的西藏動亂，兩國邊境衝突正式浮上檯面。中共領導人自然地將西藏問題與邊界問題聯結在一起。^⑬但此時中共已掌控西藏局勢，雖然對印度有所批評，仍對尼赫魯有所期待。爾後發動的一系列的文宣攻勢，中共領導人仍強調文章要留有餘地，不要把話說絕，要給尼赫魯臺階下（吳冷西 a 1999, 193-217）。

但 1959 年 8 月 25-26 日，中印邊界東段爆發了「朗久」（Longju）事件的首次武裝衝突，10 月 20-21 日，西段亦爆發了「空喀山」（Kongka）武裝衝突事件。為此，1959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舉行高層決策會議，會中確定了避免邊境衝突的隔離政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1997, 265）。7 日，周恩來在致尼赫魯的信函中，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 20 公里，脫離武裝接觸，同時建議兩國總理盡快舉行會談（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28）。但對印度而言，此提議意味著印度軍隊必須從整個東段自己的領土內後撤 20 公里，這樣中方就可以繼續占有在拉達克非法占領的大片土地。中國其實是想通過此提議，來鞏固已經蠶食的印度領土（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44）。

11 月 16 日，尼赫魯復信拒絕周恩來的建議，並提出一個新建議：在西段，作為臨時措施，印度的所有人員撤退到中國主張的國際邊界線以西，而中國所有人員撤退到印度所主張的國際邊界線以東；在東段和中段，雙方前哨不再派出巡邏隊，以避免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但在中共看來，印度拒絕在中印邊界東段後撤，目的是不願意放棄他在這裡苦心經營起來的一系列哨所陣地；而主張在西段後撤，實際上只是要中國人員片面地從自己的大片領土上撤出，因為印度實際上沒有進入過這個地區（尙勸余 2009, 147）。

註⑬ 例如「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中，特別指出「西藏叛亂後，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國提出了大片領土要求」（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9-10）。

12 月 17 日，周恩來復信拒絕了尼赫魯的建議。他重申兩國軍隊各自從邊境全線後撤的建議，並反駁了尼赫魯關於雙方撤到對方主張的國際邊界線後面的建議。但他卻告知尼赫魯，中國決定單方面從實際控制線後撤 20 公里（尙勸余 2009, 147）。1960 年 1 月，中共中央又下令：

在中方實際控制線 20 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雷英夫、陳先義 1994, 219）。

就印方的觀點而言，1959 年底至 1961 年 10 月止，中國通過向前推進實際控制線的方式，攫取印度更多的領土，因此印度不得不採取一定的防禦措施來遏止中國的侵略性推進。1961 年 11 月 2 日尼赫魯親自召開會議，並決議：印度軍隊要保持對東北邊境特區到拉達克整個邊境地區的有效占領，並應通過設立哨所或有效巡邏的方式，覆蓋所有防線缺口，絕不允許中國人偷偷蠶食印度軍隊或警察部隊尚未占領的我國領土。但他也下令，除了自衛之外，印方軍隊不得開火。1961 年 12 月 5 日，印度陸軍司令部下令，關於拉達克邊境，要求西部軍區司令部盡可能從目前的陣地向前巡邏。要建立一些哨所，哨所的位置，既要能阻止中國人進一步向前推進，又能控制已經在我國領土上建立的任何一個中國哨所。此外，命令東方司令部應盡可能向前推進，有效占領整個邊境，防線缺口應通過巡邏或設立哨所的方式加以彌補（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49-61）。

雖然印度領導人自認為上揭指令，是針對中方行動的反應，但其前提是研判中國不會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反制；^⑭尤有進者，1962 年 4 月以後更加緊推行前進政策。對此，中共於 4 月 30 日的照會中首度嚴厲警告：

如果挑釁行動繼續下去，中國部隊將不得被迫實行自衛，由此產生的

註⑭ 現有的研究及解密檔案，大多認為印度領導人對中國的意圖產生了錯誤認知。例如印度歷史學者 Harish Kapur 認為當時中國與美蘇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國內也出現嚴重的經濟困境，致使尼赫魯認為中國不會對印度採取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反制。此外，根據 Neville Maxwell 上網公布的「亨德森·布魯斯克－巴格特報告」（The Henderson Brooks Report），顯示印度情報局長 BM Mullick 也認為「新成立的哨所，中國應該不會有反應；就算有能力，也不會採取武力對抗」（Kapur 1994, 25-26; Unnithan 2014; Christensen 2006, 63-64; Pandey 1976, 423）。

一切後果，都必須由印度承擔全部責任，並且表示已經命令中國邊防部隊在印度方面最近一再侵擾的地段，恢復邊境巡邏。如果印度方面繼續侵占中國領土，並擴大他所侵擾的中國邊境地段，中國政府將被迫考慮進一步在中印邊界全線恢復邊境巡邏（世界知識出版社編 1964, 38）。

此照會顯示中共領導人認為採用外交手段解決雙方邊界爭端的機會之窗逐漸關閉，而脆弱之窗正在開啓中。

爲了遏止印度的前進政策，並在維持穩定，避免戰爭的前提下，毛澤東於 8 月 9 日批准對中印邊界西段入侵印軍的方針：「絕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李德、舒雲編著 2009, 839）。此指示可視爲是中共發動邊境戰爭前，因應緊張情勢的總方針。

從中印雙方的照會與毛澤東的指示內容得知，中共其實並無意與印度發生軍事衝突。^⑤在雙方的照會戰呈現「中方照會警告—印方復照駁斥—中方再照會警告」模式，無法以外交談判解決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才開始對印度採取「長期武裝共存」的不退讓方針，希望能遏止不利於外交談判解決邊境衝突的脆弱之窗持續擴大。

但印度在 1962 年 9 至 10 月間，逐漸將前進政策擴大到整個東段地區。中共在 10 月 3 日的照會，再次建議雙方迅速在官員報告的基礎上，舉行邊界問題的討論。印度在 10 月 6 日的復照，不僅拒絕了中共的建議，而且還提出新的先決條件，要求中共部隊撤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北的中國領土扯冬（Chedong）地區（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 15）。印度的行爲實際上已關閉了討論邊界爭議的談判大門，至此，以外交手段解決衝突的機會之窗已經關閉。

五、預期效益評估

中共的預期效益評估主要受到「敵國的預期優勢、我方的優勢邊際維持與領導人對衝突不可避免的認知」等三個指標所影響。

（一）敵國的預期優勢

延後採取軍事行動除了會遭遇到喜馬拉雅山的氣候和交通問題外，印度也將

註⑤ Allen S. Whiting 認為與韓戰相較，中印邊境戰爭案例中，中共並沒有在媒體上進行公開動員（public mobilization）（Whiting 2001, 113）。

獲取更多的準備時間，以及蘇聯與美國的援助（Sandhu 1988, 133）。蘇聯在中印爆發第一次武裝衝突後，首度於 1959 年 9 月 9 日發表「塔斯社聲明」。這是蘇聯第一次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與非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爭執時，沒有站在共產主義國家一邊。此後，蘇聯日益傾向印度，對印度的援助也與日俱增，包括向印度出售適合在喜馬拉雅山地區修築道路的裝備，並以運輸機和直升機載運印軍，解決印度在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後勤力量薄弱問題。同時，印度亦與美國改善關係，美國不僅支持印度處理邊界問題的立場，並且給予印度大量經濟援助。據統計，從 1959 年至 1962 年期間，美國已經給予或答應給印度的援助達 40 億美元（王宏偉 2009, 264-269）。

（二）我方的優勢邊際維持

中印邊界全線地區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部隊要隨時準備投入戰鬥，後勤的負擔很重，並且會使維持西藏治安的問題複雜化（陸仁譯 1976, 399-400）。尤有甚者，1962 年 10 月 5 日，印度國防部宣布在「東方軍區」之下成立一個專門對付中國的新軍團—第四軍（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15-16）。就印度的觀點，是因應中國的侵略活動升級而成立第四軍，^⑩但對中共而言，這項舉動無異改變了以往以小部隊試探、蠶食的策略，事實上是成立了一個統一作戰指揮機制，下轄包含二戰期間曾在北非和中東作戰的精銳部隊（Wortzel 2003, 339）。印度明顯已經採取攻勢作戰的軍事部署，此時若聽任印軍集結並完成作戰準備，則共軍必然會失去在決勝區域的局部優勢，甚至可能處於被動的不利戰略態勢。

（三）領導人對衝突不可避免的認知

針對中印雙方邊境衝突升溫，1962 年 10 月 11 日，尼赫魯主持高層會議，12 日尼赫魯前往可倫坡訪問，在機場針對媒體詢問給邊境特區部隊下達什麼命令時，他回答：我們的指令是把中國人從東北邊境特區驅趕出去。至於日期的決定權，完全操在軍隊手中。^⑪尼赫魯其實並無意發動戰爭，只是意圖在邊界地區保持對中國

註⑩ 根據印軍報告，截至 1962 年 9 月底，中國一直在擴展軍事基地，哨所數量擴增至 47 個，並且倚仗優勢兵力，不斷欺近中段和東段的印度邊境哨所。同時，中國還不斷修築通往中方邊境哨所的道路，運送養給、彈藥和其他戰爭物資至東北邊境特區對面，以及拉達克境內的哨所。此外，中國軍隊在北部邊境沿線的兵力，自 1962 年夏天開始，已經增加六個營，在西藏的總兵力達八個師的規模（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 2010, 67-69）。

註⑪ 根據《尼赫魯傳》的說法，尼赫魯是為了緩和大眾的激動情緒，才在機場對媒體發表他已經下令將中國軍隊驅逐出印度領土的聲明。尼赫魯並未擔心此聲明對中國的可能意涵，他認為只是意圖使印度大眾冷靜的一種對中國的純粹口頭威脅而已，並不會挑起戰爭（Pandey 1976, 423）。

的長期壓力，¹⁸但對中共而言，此言論無異是公開授權印度軍方，隨時可以發動對中國西藏地方的進攻（王宏緯 2009, 217-218）。至此，中共領導人認為雙方的直接軍事衝突已不可避免了。在外交手段失敗，戰爭不可避免的認知下，為了一勞永逸，中共的最佳決策選擇，就是對印度的挑戰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反擊，從而達到迫使印度談判，或者至少能使印度在同意進行全面的邊界談判之前承認現狀應予保持（陸仁譯 1976, 400）。

在現在採取軍事行動的預期效益評估方面，主要受到「預期勝利或然率、被擊敗的風險與第三國可能介入」等三個指標所影響。

（一）預期勝利或然率

中共在軍事上明顯居優勢，掌握了主動權，訓練有素而且武器裝備較佳。相對地，印軍情報失誤、兵火力不足、兵力分散，且缺乏山地作戰經驗與執行作戰任務的後勤支援。¹⁹戰前的印度軍事整備不足，明顯處於劣勢。

在 1962 年 8 月 9 日毛澤東下達「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指示後，中共軍事高層亦同時積極戰備。總參謀長羅瑞卿立即派遣作戰部副部長等人前往中印邊界勘察，並將前線實際情況報告毛澤東。10 月 12 日，印度揚言要把中國軍隊驅趕出去時，毛澤東終於下了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心。14 日，中央軍委討論處理印軍俘虜及有關作戰問題。15 日，召集總政相關人員，討論對戰俘的處理。16 日晚上 9 點，總參作戰部收到西藏前進指揮部呈報的作戰方案。17 日，總參召開作戰會議，當晚 11 點毛澤東批准作戰命令後，送機要局發出（舒雲 1998, 359-362）。

註¹⁸ 根據 1962 年 10 月 18 日美國駐印大使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發給國務院的電報顯示，18 日尼赫魯從錫蘭返國後，Galbraith 立即趕到官邸與其會談。尼赫魯堅決表示：不管需要一年、五年或者十年的時間，都要將中國人趕走，但印度不會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運用區域的地面部隊，保持對中國的長期壓力，而且暗示此一措施將擴大到西段拉達克地區（Galbraith 1962）。

註¹⁹ 例如 Bertil Lintner 引述參與 1962 年瑟拉山口（Sela）之役的印度軍官古迪普·辛格·克雷爾（Gurdip Singh Kler）中校的說法，他認為當時印度也採取增建新軍事單位等備戰措施，但軍隊武器、設備與彈藥的資金都不足。在西段戰鬥中，中國更清楚掌握了印軍的位置，以及每個據點的人數與武器種類（林玉菁譯 2018, 123, 134-135, 153）。Durga Das 的研究顯示印軍缺乏山地作戰經驗，訓練與裝備大多是依據平原作戰而開展、配備的（Das 2004, 362），此外，印軍的兵力部署也過於分散（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 2010, 93-271）。再者，1962 年 10 月 18 日美國駐印大使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發給國務院的電報，顯示東北邊境特區天氣寒冷，共軍的禦寒衣物與補給獲取都優於印軍，而印軍的冬季裝備因為空投損失過大，改採地面補給（Galbraith 1962）。

前線方面，根據陰法唐回憶：^②

1962 年 6 月 11 日西藏軍區組建前進指揮部，代號藏字 419 部隊，主要配合西段反蠶食鬥爭的準備，總兵力約八千人。6 至 9 月，419 部隊在政治動員的同時進入了緊張的軍事訓練。從單兵動作到班、排、連戰術訓練，再到營、團規模的實彈演習，並對部隊作了「汰弱配強」，對三分之一的幹部作了調整，把老弱病殘的幹部戰士調離了作戰部隊（魏碧海 2005, 7-9）。

由此可知，共軍在 6 月即開始加強前線的軍事準備與戰場經營，共軍高層負責作戰計畫人員亦親臨現地勘察，甚至連戰俘處理問題一併列為高層決策重點。此亦說明了中共高層已做好縝密的規劃與準備，預期勝利或然率極高。

（二）被擊敗的風險

1962 年 10 月 20 日第一階段戰役前，在西段地區中印兵力對比約 1：1，但印軍兵力分散，配置於固定而分散的哨所，共軍則具有機動性（Wortzel 2003, 340）。在東段的克節朗（kyunglung）地區，中印兵力對比為 3：1，共軍三倍於敵。東段的其他地區兵力概等，分別兩萬餘員。戰役發起後，共軍可在克節朗方向集中了絕對優勢兵力，在其他方向實施佯攻，以牽制當面之敵。第二階段時，中印雙方軍力對比為 1.5：1（魏碧海 2005, 10-11）。許多參戰的中共部隊已經在西藏附近駐紮多年，其中部分人員曾參加過平定康巴叛亂戰役，在體能上也已經適應高海拔地區作戰（陸仁譯 1976, 447）。

補給線方面，東段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在 1954 年 12 月 25 日同時通車到拉薩（魏碧海 2005, 7），而西段的新藏公路則於 1957 年完工。同時，作戰地區的地形和地理特徵都對共軍較有利（Wortzel 2003, 339）。在東段與西段地區，共軍只需要通過極短的山路即可滲透到印軍據點的外圍。相對地，印度通往邊界的道路地勢險峻，依靠沒有修整的公路和小道。特別是東段地區大部分印軍的補給，受到空投的限制，人力搬運也要好幾天（沈志華、楊奎松主編 2009, 132）。

由此可知，戰前的戰略態勢對共軍有利，不論在兵力與戰力、兵力位置、補給線與作戰正面的關係及爾後作戰發展上，共軍都具有優勢，被擊敗的相關風險較低。

註② 陰法唐將軍時任共軍主力「藏字 419 部隊」政委。

（三）第三國可能介入

此亦為中共領導人決定軍事行動的重要指標。中共對外使用武力向來具有「時機拿捏得宜」（opportunistic timing）的特徵（Burles and Shulski 2000, 5-20）。1962 年 10 月，美蘇陷入古巴飛彈危機。1962 年 10 月 8 日，中共領導人通知蘇聯駐華大使，表示印度在中印邊界集中了大批軍隊，看似要發動戰爭，希望蘇聯勸說尼赫魯懸崖勒馬。10 月 13 日，赫魯雪夫召見中共駐蘇大使劉曉，表示支持中國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糾紛的立場，並且還表示，如果蘇聯處在中共的地位，也是要對印度提出強硬抗議，並採取同樣的立場（吳冷西 b 1999, 497-498）。赫魯雪夫希望在古巴飛彈危機中能獲得中共的支持，因此蘇聯在中印邊境衝突的政策，暫時從「中立」轉向支持中國（劉曉 1998, 121-122）。此亦為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最佳時機，不僅可避免美國的介入，亦可獲得蘇聯的暫時支持，消除國際干預的困境。

表 7 中共發動中印邊境戰爭之預期效益評估表

評估 指標 案例	延後採取軍事行動			現在採取軍事行動			評估 結果
	對敵國的 預期優勢	我方的優 勢邊際維 持	領導人對衝 突不可避免的 認知	預期勝利 或然率	被擊敗的 風險	第三國可 能介入	行動
1962 年中印 邊境戰爭	<	<	>	>	<	<	

說明：符號「<」代表較低；「>」代表較高；「=」代表概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肆、模式檢驗

展望理論認為當爭議雙方的領導人認為其行動是防衛合法的現狀時，將使雙方處於最危險的情境。預防性動機理論強調預防性戰爭較關注的是將自己未來衰退的損失最小化，而不是藉由現在發動戰爭以取得最大化的利得。中印邊境戰爭符合上揭理論的核心觀點。

透過本案例的過程追蹤，顯示「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是中共使用武力的主要原因，並置重點於阿克賽欽戰略要域，而不是收回全部的爭議

領土；其軍事行動目的亦非追求全勝，而是希望能夠「以打促談」。此外，不管是戰前的單方面隔離政策，或是爆發兩次大規模軍事衝突，並取得壓倒性勝利後的 1962 年 10 月 24 日及 11 月 21 日兩份聲明，中共亦始終強調以 1959 年 11 月 7 日的「實際控制線」為基準，向後撤 20 公里，以避免衝突的擴大（人民出版社編 1962 第 2 版，1-3, 23-26）。中共的談判與決策過程，充分顯示出現狀維護，「防止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持續衰退」的預防性動機。亦即證實本模式的第一個假設：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使用武力。就本案例而言，周邊權力地位的內涵係「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

另如 Jervis 所言，雙方都是維持現狀的國家，都不希望發生衝突，但衝突還是發生的重要原因，就是領導人的錯誤認知。中印兩國領導人在解決邊界領土爭議過程，明顯肇生錯誤認知。印度的錯誤認知，除了堅持本身傳統邊界認知、錯估中共的進攻意圖，誤以為不會受到中共大規模軍事行動反制，進而實施前進政策外，中共本身的政策失誤亦為重要原因，造成印度領導人對中共的談判三步走策略產生了錯誤認知，而採取被中共視為威脅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對應政策。若中共在《西藏協定》談判過程中納入邊界議題或採取較明確的立場，就能在第一時間遏止威脅趨勢，或至少能在印度領導人錯誤認知的框定過程中，達到澄清的作用。

再者，如動態差異理論的核心觀點，國家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預期越高，就越容易發動預防性戰爭。印度在 1962 年 4 月後，積極採取更具挑釁性的前進政策，但當前進政策不僅已跨越了中共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程度的決策參考點—阿克塞欽戰略要域，而且更將前進政策擴大到全部邊界時，中共領導人面臨了抉擇。雖然採取「長期武裝共處」方針，可以暫時遏止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衰退的必然性，阻止印度的前進政策，但此舉不僅會製造更多的小型衝突，也可能造成邊境衝突長期化，使中共在邊疆地區耗費寶貴的資源。中共領導人透過預期效益評估，而決定無法再延後軍事行動，遂改變了原有的「長期武裝共處」方針，採取具有政治性意涵的局部戰爭回應，以遏止中印邊境衝突長期化的趨勢，迫使印度回到談判桌，或者至少能使印度在同意進行全面的邊界談判之前承認現狀應予保持。

上述周邊權力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整體威脅趨勢評估，亦證實本模式第二個假設：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強弱，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選擇，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就本案例而言，如表 8 所示，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程度強、衰退的必然性弱的整體威脅趨勢評估，促使中共採取「局部戰爭」的決策選擇，以因應

威脅趨勢的持續惡化。

最後，綜整本文各表的分析成果，透過表 9 可以整體顯示中共發動 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的動態衝突抉擇檢驗情形，並初步驗證了本模式的適用性。

表 8 中共發動 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之整體威脅趨勢評估與決策選擇類型表

		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必然性	
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	弱	弱	強
	強	局部戰爭	

說明：同一案例中，可能會隨著衝突逐漸升高，而在各階段出現不同的決策選擇。本表僅顯示衝突的最終決策選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表 9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檢驗示意表

模式 檢驗 案例	周邊權力 地位護持 內涵	領導人的錯誤 認知		周邊權力 地位衰退 的程度		周邊權力 地位衰退 的必然性		預期效益 評估		預防性動機		決策選擇
		有	無	強	弱	強	弱	延後	行動	有	無	
1962 年 中 印 邊 境 戰 爭	邊疆領土 主權談判 議價權力 維護	有		強		弱		行動		有		局部戰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編製。

伍、結語

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及核心利益不斷擴展，也加大了中共與他國的摩擦機會。中國未來是否會對外使用武力，這是一個大國崛起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各界關注

的議題。本文試圖解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決策機制，在模式的建構上，採用理論借鑑與概念化的過程，歸納出使用武力的原因，並且提出中介因素、四項主要關鍵因素及相關評估指標，建構出一個具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此議題的理解及詮釋，也可做為研判未來中共對外軍事衝突前的觀察與預應參考。

透過 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案例分析，證實了本文的兩個理論性假設：(1) 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使用武力。就本案例而言，周邊權力地位的內涵係「邊疆地區領土主權談判議價權力維護」；(2) 中共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強弱，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選擇，而呈現動態的衝突抉擇樣式。本案例的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程度強、衰退的必然性弱的整體威脅趨勢評估，最終促使中共採取「局部戰爭」的決策選擇，以因應威脅趨勢的持續惡化。同時，如表 9 所示，基本上，回應了本文的研究問題，並且初步驗證了本模式的適用性。此外，本文有關「預防性動機」的研究成果，顯示僅有戰爭（衝突）原因，並不代表中共必然會使用武力，尚須具備預防性動機的中介因素，中共才會最終採取預防性軍事行動，此亦顯示以預防性動機為核心概念的預防性動機理論，在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領域上，不僅具有啟發性，且能提供獨特的解釋力。

本模式適用於單一或多重個案研究，本文因篇幅所限，僅能進行單一個案研究，然為強化解釋力，本模式仍待更多的個案檢驗。在案例選擇上，依據前述四項決策選擇與文獻解密程度，可進一步檢驗韓戰（大規模有限戰爭）、懲越戰爭（局部戰爭）、珍寶島衝突、三次臺海危機（引發危機）。言語警告方面，可採用 1999 年「兩國論」作為案例，並且可以視為反例。至於其他案例，例如 1988 年中越邊界衝突、1974 年中越西沙海戰及 2012 年中菲黃岩島衝突等攸關南海諸島爭端之案例，未來相關文獻解密後，亦可納入研究。

最後，本模式亦具有侷限性，主要是未將國內政治與官僚政治納入分析。這兩項因素也是西方學界探討戰爭（衝突）的關鍵因素（Levy 1987, 87, fn. 13），囿於模式簡約原則及文獻限制，故而省略之。未來隨著中共檔案的開放，上述的侷限，亦可作為精進本模式的研究重點。

* * *

（收件：108 年 4 月 25 日，接受：109 年 2 月 17 日）

The Dynamic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Pattern for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A Case Study of the 1962 Sino-Indian Border War

Hung-Bo Hua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rekindled conflict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Japan, India,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n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thesis's research questions are: there are numerous causes for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could all these causes be conceptualized? Are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s of force capricious? unexplainable? or could only be analyzed statically? If not, what mechanism facilitates Communist China's final decision for the use of force? What factors would limit or influence the final decision to use force (the scale of the conflict) to exhibit a dynamic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pattern?

This thesis draws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various theories such as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theory, 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 alliance theory and window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gnitive theory in psychology, prospect theory in economics,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rough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causes for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the author wanted to construct a "dynamic conflict decision-

making pattern for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along the axis of preventive motivation. The 1962 Sino-Indian Border War wa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and was analyzed using both the process-tracing and typology methods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pattern. By way of the case study, the two following research hypotheses were verified:

First, Communist China's use of force against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challenged its authority and position in the region were caused by preventive motivations to prevent any decline of its regional status. Second, the final decision for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was influenced by the strength of its preventive motivations and exhibited a dynamic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pattern. Theref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pattern was also preliminarily validated.

Keywords: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Dynamic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Pattern, Preventive Motivations, Sino-Indian Border War.

參考文獻

- 人民出版社編，1962，第2版，《中印邊界問題（增訂版）》，北京：人民。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Version 2. *Zhongyin bianjie wenti, zengding ban* [Sino-Indian Border Issue, updated vers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terature research room. 1997. *Zhouenlai nianpu: 1949~1976, zhongjuan* [Zhou Enlai's Chronology: 1949~1976, middle volume].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1993，《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tic History. 1993. *Zhouenlai waijiao huodong dashiji* [Zhou Enlai's Diplomatic Events].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 王宏緯，2009，《當代中印關係述評》，北京：中國藏學。Wang, Hong-wei. 2009. *Dangdai zhongyin guanxi shuping*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Sino-Indian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 王宏緯、王至亭譯，Karunakar Gupta著，1990，《中印邊界秘史》，北京：中國藏學。Wang, Hong-wei, and Wang Zhi-ting, trans. Karunakar Gupta. 1990. *Zhongyin bianjie mishi*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1964，《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1962年第九集）》，北京：世界知識。World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1964. *Zhonghuarenmin gongheguo duiwai guanxi wenjianji, 1962nian dijiuj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Document Collection, 1962: Volume 9].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 吳冷西a，1999，《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北京：中央文獻。Wu, Leng-xi a. 1999. *Shinian lunzhan—1956~1966: Zhongsu guaxi huiyilu, shang* [Ten Years of Controversy-1956~1966: Memoir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Volume 1].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 吳冷西b，1999，《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北京：中央文獻。Wu, Leng-xi b. 1999. *Shinian lunzhan—1956~1966: Zhongsu guaxi huiyilu, xia* [Ten Years of Controversy-1956~1966: Memoir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Volume 2].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 李德、舒雲編著，2009，《林彪日記（下冊）》，紐約：明鏡。Li, De, Yun Shu. 2009. *Linbiao rihj, xia* [Lin Biao Diary, Volume 2]. New York: Der Spiegel Press.

-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2009，《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十四編：中國與南亞）》，上海：東方。Shen, Zhi-hua, and Kui-song Yang. 2009. *Meiguo duihua qingbao jiemi dangan: 1948~1976, dishihsihbian: zhongguo yu nanya* [US Information Decryption File against China: 1948~1976, Part XIV: China and South Asia].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Center.
- 尚勸余，2009，《尼赫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關係（1947~196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Shang, Quan-yu. 2009. *Nihelu shidai zhongguo hey indu de guanxi: 1947~196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Nehru Era: 1947~1964].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 林玉菁譯，Bertil Linter著，2018，《中國的印度戰爭：世界屋脊上的衝突，亞洲兩大區域強權的角力》，臺北：馬可孛羅文化。Lin, Yu-jing, trans. Bertil Linter. 2018. *Jhongguo de yindu jhanjheng: Shihjieh wujishang de chongtu, yajhou liangda chyuyu chiangchyuan de jiaoli* [China's Indian War: Collusion Cours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aipei: Marco Polo Culture.
- 姚雲竹、張蘭琴、雷湘平等譯，P. B. Singh, and A. A. Atalai著，2010，《印度：1962年與中國衝突的歷史》（內部資料），北京：軍事科學。Yao, Yun-zhu, Lan-qin Zhang, and Xiang-ping Lei, trans. P. B. Singh, and A. A. Atalai. 2010. *Yindu: 1962nian yu zhongguo chongtu de lishih* [India: History of conflict with China in 1962].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 徐子婷等譯，Gary Goertz著，2010，《社會科學概念方法論的思考》，臺北：韋伯文化。Syu, Zih-ting, trans. Gary Goertz. 2010. *Shehuei kesyueh gainian fangfalun de sihkao*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Taipei: Weber Culture.
- 秦亞青，2008，《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爲（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Qin, Ya-qing. 2008. *Bachyuan tisi yu guoji chongtu: Meguo zai guoji wujhuang chongtu jhong de jhihchih singwei (1945~1988)* [Hegemonic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US Supporting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1945~1988)].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秦亞青譯，Robert Jervis著，2003，《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北京：世界知識。Qin, Ya-qing, trans. Robert Jervis. 2003. *Guoji jhengjih jhong de jhihjyueh yu tsuowu jhihjyueh*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 張植榮，2000，〈中印關係的回顧與反思：楊公素大使訪談錄〉，《當代亞太》，8：17-25。Zhang, Zhi-rong. 2000. "Zhongyin guanxi de huigu yu fansi: Yanggongsu

- dashi fangtanlu*”[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Yang Gongsu]. *Contemporary Asia Pacific*, 8:17-25.
- 陸仁譯，Neville Maxwell 著，1976，《印度對華戰爭》，香港：南粵。Lu, Ren, trans. Neville Maxwell. 1976. *Yindu duihua zhanzheng* [India's China War]. Hong Kong: South Guangdong.
- 舒雲，1998，《大將羅瑞卿》，北京：解放軍文藝。Shu, Yun. 1998. *Dajiang luoruiqing* [General Luo Ruiqing]. Beiji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iterature and Art.
- 黃鴻博，2012，〈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預防性動機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Huang, Hong-bo. 2012. *Jhonggong dueiwai shihyong wuli jhih dongtai chongtu jyuehze moshih: yufangsing dongji fensi* [Dynamic Conflicts and Decision-Making Model in Communist China's External Use of Force: An Analysis of Preventive Motivations]. Taipei: Ph. D. dis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 雷英夫、陳先義，1994，《統帥部參謀的追懷》，南京：江蘇文藝。Lei, Ying-fu, and Xian-yi Chen. 1994. *Tongshuaibu canmou de zhuihuai* [Remembrance of the Staff of the Commanding Department].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劉曉，1998，《出使蘇聯八年：1955~1962》，北京市：中共黨史。Liu, Xiao. 1998. *Chushi sulian banian: 1955~1962* [Eight Years to the Soviet Union as An Ambassador: 1955~1962]. Beijing: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 鄭經言譯，Neville Maxwell 著，2000，〈中印邊界爭端反思（上）〉，《南亞研究季刊》，1：25-34。Zheng, Jing-yan trans. Neville Maxwell. 2000. “*Zhongyin bianjie zhengduan fensi, shang*”[Reflection on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Volume 1]. *South Asian Research Quarterly*, 1: 25-34.
- 隨新民，2007，《中印關係研究：社會認知視角》，北京：世界知識。Xin-mín, Sui. 2007. *Zhongyin guanxi yanjiu: shehui renzhi shijiao* [Sino-Indian Relation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 魏碧海，2005，〈陰法唐將軍訪談錄〉，《軍事歷史》，2：6-19。Wei, Bi-hai. 2005. *Yinfatang jiangjun fangtanlu* [Interview with General Tang Yin]. *Military History*, 2: 6-19.
- Burles, Mark, and Abram N. Shulsky. 2000.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 Cashman, Greg, and Leonard C. Robinson, eds.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uses of War: Patterns of Interstate Conflict from World War I to Iraq*.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6.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p. 50-8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David, and James E. Mahon, Jr. 1993.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4): 845-855.
-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as, Durga. 2004. *India: From Curzon to Nehru and After*. New Delhi: Rupa.
-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1999.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Evera, Stephen Van.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vera, Stephen Van. 1999.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avel, M. Taylor. 2007.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3): 44-83.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October 18, 196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9/d177> (September 23, 2019).
- Gerring, John. 2001.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Steven A. 1990.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8. "China's Militarized Dispute Behavior 1949~1992: A First Cut at the Data." *The China Quarterly*, 153: 18-20.
- Kapur, Haris. 1994.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92: Shadows and Substance*. New Delhu: Saye Publication.
- Krasner, Stephen D.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mb, Alastair. 1964. *The China 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y, Jack S. 1983.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s of War: Theoretical Linkage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World Politics*, 36 (1): 76-99.
-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 (1): 82-107.
- Levy, Jack S. 1997.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1): 87-112.
- Levy, Jack S. 2003.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135 (2): 215-241.
- Levy, Jack S. 2007. "Preventive War 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oots." In Stanley A.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pp. 175-200. New York: Routledge.
- Levy, Jack Sand J. R. Gochal. 2001. "Democracy and Preventive War: Israel and the 1956 Sinai Campaign." *Security Studies*, 11 (2): 1-49.
- Midlarsky, Manus I. 1990. "Systemic Wars and Dyadic Wars: No Single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16 (3): 171-181.
- Pandey, B. N. 1976. *NEHRU*. London: Macmillan.
- Renshon, Jonathan B. 2007. "The 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Preventive War." In Stanley A.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pp. 201-230. New York: Routledge.
- Sandhu, Bhim. 1988. *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 Stoessinger, John G. 1978. *Why Nations Go To War*, 2nd ed.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
- Unnithan, Sandeep. 2014. "Henderson Brooks report lists the guilty men of 1962"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the-guilty-men-of-1962-india-china-war-jawahar-lal-nehru-krishna-menon-185333-2014-03-18> (August 12, 2019)
- Vasquez, John A., and Marie T. Henahan. 2001.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 1816-199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8 (2): 123-138.
- Whiting, Allen. S. 2001.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 103-131.
- Wortzel, Larry M. 2003. "Concentrating Forces and Audacious Action: PLA Lessons from the Sino-Indian War." In Laurie Burkitt et a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pp. 327-352.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Wright, Quincy. 1942. *A War Study, Vol.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